

# 中国西部最早的高等学府

## ——陕西大学堂

姚远

(西北大学学报编辑部, 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 根据对清末报刊文献的再发掘, 清理出从春明学舍和青门学舍、养正书院、崇化书院、游艺学塾(格致学堂)、陕西大学堂、西北大学的清晰脉络, 并对陕西大学堂的源流、承袭、沿革、校舍、校政、宗旨等作了全面的历史性论证。结论认为: 陕西大学堂是中国西部创建最早的地方性、综合性的新式高等学府, 奠定其后组成西北大学的基础, 同时也是陕西地方教育由书院制度向学堂制度的转折, 标志着以引入西学为标志的新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

**关键词:** 陕西大学堂; 西方学制; 东洋教育; 清末学潮; 近代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72X(2000)03-0077-06

### 一、背影 创建与地位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一月二十九日, 避逃八国联军攻京而驻陕的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为取悦于帝国主义、拉拢资产阶级上层和巩固封建统治, 在西安发布“新政上谕”。“上谕”特别强调: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 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穷变通久, 见于大易, 损益可知, 著于论语, 盖不易者, 三纲五常, 照然如日星之照世, 而可变者, 令甲令乙, 不妨琴瑟之改弦”。这就是“新政”的基本原则。据此, 要求各方大员参酌中西政要, 就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提出陈奏。此后, 清廷主要根据张之洞等的陈奏, 对封建统治

机体作了一些皮毛性的调整, 即所谓“回銮新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 清廷就新政又在西安发布“兴学诏”, 谕令: “各省所有书院, 于省城均设大学堂”, 并规定所有学堂“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 以历史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sup>[1]</sup>。

作为清廷临时的“行在”的西安, 对实施新政自不甘人后。距“兴学诏”发布不到一个月, 陕西巡抚李绍棻即奏请成立陕西大学堂, 并对学堂经费、教师、校舍等提出解决办法, 也许光绪帝与慈禧太后正忙于由西安回銮北京(1901年10月6日由西安起程, 1902年1月3日抵京), 无暇批奏。因此, 陕西巡抚升允于1902年初再奏开办陕西大学堂事, 并奏陕西大学堂章程。此奏很快御批获准,

收稿日期: 2000-05-29

基金项目: 陕西省教委专项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 姚远(1955—), 男, 陕西省岐山县人, 西北大学学报编审, 主要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

沈桐生辑: 《光绪政要》卷二十六。

陕西大学堂遂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月正式成立,并于当年3月正式开学。

在此前后,我国成立的国立、省立性质的学堂,且具有管理国家学务或管理地方学务的国家最高学府或地方最高学府,主要有天津中西学堂(天津,1895,延续为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惟一国立,北京,1898年延续为北京大学)、广西学堂(广州,1899,1902年改为两广大学堂,后又改为广东高等学堂)、山东大学堂(济南,1901延续为山东大学)、浙江求是大学堂(杭州,1901,后改为浙江大学堂,延续为浙江大学)、山西大学堂(太原,1902,延续为山西大学)。当时,中国西部省份近代高等教育萌芽较早的地区主要有陕西西安、四川成都、甘肃兰州等。其时,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四

川大学的前身)尚在筹备中,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前后,才正式成立,四川的通省师范、法政、存古、藏文、农政、工业等学堂也在1905年后陆续成立。甘肃以成立于宣统元年(1909年)的甘肃法政学堂(兰州大学的前身)为最早。云南、贵州、广西、重庆、新疆等省区市均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才有高等教育的萌芽。青海、宁夏、西藏、内蒙古等西部省区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有高等教育。因此,陕西大学堂是中国西部省份成立最早的地方性新式高等学府。

在此前后,陕西省城及附近的学堂尚有10余所,各直隶州均设立中学堂,各州县也先后设立高、初等小学堂,以致“陕西学堂林立”<sup>[2]</sup>。当时,省城及附近的主要学堂见表1。

表1 清末陕西的主要学堂(1898~1911年)

名称	校址	创建年月	倡建人
游艺学塾	省城崇化书院旧址	1898—01	陕西巡抚魏光燾奏立
武备学堂	省城西关	1898—05	魏光燾奏立
陕西中学堂	西安北院门西安府试院内	1898—07	魏光燾奏立
陕西大学堂	省城崇化书院与咸长考院旧址	1902—01	陕西巡抚升允奏立
宏道工业学堂	泾阳宏道书院旧址	1902	督学沈卫
第一师范学堂	省城关中院旧址	1903	陕西巡抚升允奏立
陕西课吏馆	省城万寿宫	1903—04	巡抚升允奏设
陕西农业学堂	城垣西南隅	1904	西安知府尹昌龄
高等巡警学堂	按察使署北院	1906	巡抚曹鸿勋奏设
陕西法政学堂	由课吏馆改设	1907—03	巡抚曹鸿勋奏设
陕西客籍学堂	省城南教场西	1908	提学使余 <sup>堃</sup>
存古学堂	举院供给所址	1909	巡抚恩寿奏设
女子师范学堂	省城梁埠街	1910	提学使余 <sup>堃</sup>
陕西实业学堂	旧贡院北	1910	西安知府尹昌龄

## 二、源流 承袭与沿革

作为陕西近代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陕西大学堂的成立,绝非凭空而设。其实,它是由清代书院、学塾、考院等学制演变而成的,特别是由书院制度向学堂制度的转折,标志着以引入西方学制为标志的新的教育体制的形成。陕西按察使、陕西大学堂兼任监督樊增祥也指出:“陕西高等学堂,……其先沿于旧学”<sup>[3]</sup>。

陕西大学堂的源头可远溯至清代中期的乾隆年间。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位于省城的咸宁、长安两县各于城郭之外建立学舍(相当于书院),西称青门学舍,东称春明学舍,专教两邑童子。其中,长安县的青门学舍以西安西关旧蚕馆(今西安西关正街西段路北西新民巷附近)改建而成,由县拨当商生息银六十两作为每年维修学舍之费用,而无师生津贴膏火之费。咸宁县的春明学舍以西安东关文昌祠(今西安东关长乐坊)改建而成。两学舍由于师生生活补给来源渐枯,加上年久失

1902年,巡抚升允奏改为陆军小学堂。

修，逐渐颓废。

清嘉庆七年（1802年），清军同知叶世倬于西安城内卧龙寺巷购置房产，徙并青门学舍与春明学舍为养正书院，与关中书院分课生徒，并由清军同知与咸宁、长安两县共同主办。其旧址在今西安城区柏树林街东卧龙寺巷。

清道光年（1821~1850年）间，养正书院更名为崇化书院。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由卧龙寺徙址于旧清军同治署东侧（约在今西安东厅门路北西安高级中学东侧）。

甲午战后，办学日趋实用，陕西巡抚魏光焘根据粮道姚协赞和举人薛信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1898年1月）奏设一所格致学堂，名曰游艺学塾。“游艺学塾者，乃书院改良初具学堂雏形之教育机关也”<sup>[4]</sup>，校址即在崇化书院旧址。游艺学塾，又名格致学堂，而格致为古代“科学”的代名词，因此这是一所培养各种专门科学理论和实用人才的新式学校，在陕西的书院向学堂的嬗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走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办学体制的重要过渡。正如陕西巡抚魏光焘所说：“拘守旧章，既滞于通今，未由一发其扃钥；徒尚西学，又或轻于蔑古，不惮自抉其藩篱。欲救二者之偏，惟有尊重经训，以端其趋，博综子史，以观其变，由是参考时务，兼习算学。举凡天文、地舆、兵、农、工、商、与夫电、化、声、光、重（机械）、汽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分门研讨，务臻其奥，而语言文字尤为初学阶梯，亦应设立学习”<sup>[5]</sup>。这实际上就是游艺学塾的办学方针。据此，游艺学塾由前任粮道姚协赞任总办，聘川人肖开太为教习，授算学，湘人葛道殿为分教习，授格致，旗人阎某授英语，薛信、阎培棠（甘园，1864~1942）管理理化仪器，毛昌年管理图书兼任会计，周铭任检查。课程设置除经史外，算学亦为必修，其余的电、化、声、光、重、汽，以至兵、农、工、商、地学等，则可任选一二门。对于英语学习，则招14~17岁口齿清晰，并已读经书一二部的学生20名专开一班。另外，设有“通晓算学兼精制造”的正课生4名，可兼任学塾的管理事宜和给副课生上一些课程。学塾总计学生70名。学塾中备有从津沪购置的图书、实验仪器和材料，可供学生实验制造之用。如有学生“能自出心裁制器”或“查出矿产

开采畅旺者”，从获利中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奖金，以资鼓励。学生学习3年期满，学业优异者，咨送总理衙门，经考试录用。学塾当年开办经费由陕西粮道姚协赞筹银4000两，议定以后的常经费合计每年6100两。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月，陕西巡抚升允奏准在原游艺学塾旧址（即原崇化书院旧址）和西安六海坊原咸宁、长安两县考院旧址创建陕西大学堂。根据清末关于京师设大学堂，省会设高等学堂的制度，陕西巡抚夏时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将陕西大学堂改为陕西高等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始办正科。辛亥革命后，改为陕西高等学校。1912年3月，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张凤翔决定将陕西高等学校（陕西大学堂）、关中法政大学（陕西法政学堂）、三秦公学（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陕西客籍学堂等合组为西北大学。

### 三、校舍、校政与办学宗旨

#### （一）学堂规模与办学宗旨

陕西大学堂在西安六海坊原省城成长考院和西安府崇化书院旧址（即今西安东厅门路北西安高级中学校址）上扩建而成。原考院和崇化书院相邻，二者合计号舍有三四十间，而且隙地空阔，扩充空间广大。其西紧贴端履门大街，东界箭道，北为东大街，西南邻碑林、文庙，南邻卧龙巷原养正书院旧址，大致呈南北长东西宽的长方形展布<sup>[6]</sup>。在此基础上，校舍有两次较大的扩建工程：第一次是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学堂初办，陕西巡抚升允拨库银两万两（实际支出三万余两）用于兴造堂舍厅序，形成初期规模；第二次是在改为陕西高等学堂之后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冬至次年（1906年）春的扩建工程，陕西巡抚曹鸿勋委派县令涂嘉荫为监修，先派人带工匠到湖北省城考察学堂建筑，回陕后，仿华、洋各式建成讲堂、斋舍、自习室、图书仪器室共计73处，大小房舍252间，共用银18300余两。第二次大规模扩建竣工之后，学堂监督樊增祥的“验收稟”指出：“查近来学务蔚兴，凡办学堂者，未遑教育，先谋建筑，各省营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亦十数万，吾陕学堂规制不

<sup>[4]</sup>《秦中书局汇报》第6册。

亚东南。此次添加诸工，就前筑之堂基，仿东洋之图式，历时半年之久，聚工成阵，积料如山。官绅十许人常川监视，及其成也”，樊增祥还称赞监修委员涂喜荫：“节省至此，皆由该令一身艰苦卓绝，……嘉叹之余，益深感佩”<sup>71</sup>。这两次扩建共用银48 000余两。在这两次较大的扩建工程间，“屡有改作”，学堂提调仇继恒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秋添建洋式讲堂三座。在第二次扩建前后，一面赴日本考察学务，参观东洋校舍，一面又赴湖北武昌考察西式学堂建筑，设计又按“华、洋各式”，看来，其建筑必定是中西合璧之作。陕西大学堂初期的二门联形象地形容了学堂校舍的浩大规模：

“广厦构众材看椽题文梓青牛多士莫忘新缔造，城中有四大与岳麓梅花白鹿同时全拓旧规模”。其中“城中有四大”，大约是说大学堂的校舍为城中四大建筑群之一，不亚于岳麓书院、梅花书院和白鹿书院旧时的规模。

《陕西大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其办学宗旨为“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章程对此进一步指出：“必明体乃有益身心，必达用乃有裨于家国。绩学尚已，敦品优先，若不知砥行饬躬尊君亲上为何事，即智慧日启，学业日精，流弊将不可问；甚有摭拾狂警谬说，谓人人有自主之权，驯至诋訾圣贤，畔道离经”<sup>81</sup>。这里的“敦品优先”、“尊君亲上”，都要求学生忠于清王朝，并将有民主色彩的言论视为异端，斥为“狂警谬说”，如有违者，将“立时斥逐”。由于要“以中学为体”，大学堂内还“恭祀至圣先师孔子暨诸先儒”木柱，每逢初一、十五日由教习率领各班学生行礼。引西学入学堂，毕竟是新式学堂的重要特点，因此在将“四书”、“五经”定为必修课的同时，性理格致、政治时务、地舆、兵事、天文、算学、地质、测量、电化等西学课程还是占了较大比例。

办学宗旨还集中体现在陕西大学堂的各处楹联<sup>91</sup>中。其大门联为：

“天大地大王者亦大九州共识尊王义，古学今学圣人之学多士毋忘近圣居。”

其官厅联为：

“博古通今适用世用，砥德励行报以国华。”

陕西巡抚升允为其夫子庙题写的堂联为：

“日月经天谁谓西行不到，诗书未烬庶几东周可为”。

大学堂总教习屠仁守所题的讲堂联为：

“道统垂五千年由尧舜而来继以孔孟述以程朱大学在明新曲说异端严摈绝，声教讫九万里唯天地与立义则君臣亲则父子中庸赞化育群伦庶物广甄陶。”

江西巡抚夏某为陕西大学堂所题联为：

“百家虽殊言必衷圣，三代所共学以明伦。”

以上楹联对“以中学为体”，严摈“异端邪说”，尊崇孔、孟、程、朱儒学，讲求君臣父子纲常、中庸之道的办学宗旨和中心教学内容作了进一步阐发，表明这所新式学堂未脱书院传统教育模式的痕迹。

陕西大学堂的楹联中，还反映了一些新的气息。如又一处讲堂联有：

“吾道自有真真理学不迂真知巧不奸真经济不杂言咙而衷诸圣可以药一切新旧党人少年读时务书先要认明忠孝字，

士流贵耻耻志力未坚耻纪纲未立耻艺业未精官失而守在夷亟须还三代神灵故物秀才任天下事莫虚生长帝王州。”

陕西按察使樊增祥所题的讲堂联：

“立命安身在性理今颁讲求俄铅英槩光化电汽诸学为庠序通才先须自信是孔氏干城是本朝臣庶即体操练将奇器考工互市鬻财要贵脚跟站定其前堂置四书集注五子近思时时勿违曾孟程朱乃不投西夏酒垆去耳户庭广大并非琐注虫鱼惟圣教覃敷差免籍谈忘祖，

经世行远以交章士各分占内政外交天算舆地一门备君相简擢异日皆当为阙廷宣谕为幕府掌笈至场屋呈能私家著录绝域奉使并宜叱属雅驯所作悉如报馆野言胥徒故牒比比弗识曹刘燕邗奈重贴江东帐下笑向骨采蹇腾始见中原麟凤倘吾谋获用岂忧秦国无人。”

官厅联：

“神仙官属更休论乎版常忝便书佐茶僮到此自成关学派，

松桂高寒不妨带头巾气息对井栏亭榜置身仍在玉堂间。”

这些楹联反映了三个方面的办学目标：一是再次强调要学习“俄铅英槩光化电汽诸西学”，必须先“自信是孔氏干城是本朝臣庶”，必须先明“忠孝”，“耻纪纲未定”，即以中学为体和忠于清王朝；二是强调学生要“为庠序通才”，这种“通才”要博古通今，既明西学又精儒学，且对“体操练将奇器考工互市鬻财”、“内政外交天算舆地”，亦即兵事、技

术、工程、经济、政治、外交、天文、数学、地理等均要通融，如此才能“立命安身”，“才任天下事”，也才能“砥德励行报以国华”；三是为陕西地方培养人才，并教学生热爱陕西，承续关学，为地方建设献力，这在“莫虚生长帝王州”、“岂忧秦国无人”、“到此自成关学派”等联语中表露无遗。

## （二）校政、职事与开支

陕西大学堂除管理本学堂的学务外，同时还兼有全省教育行政中枢机构的职能，负责管理全省中、小学堂的学务。大学堂的监督、总办，既是大学堂的校长，又是全省教育行政的负责人。这项职能维持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是年，陕西学政奏请按照《奏定学堂章程》，取消管理全省学务的职能，并专设陕西学务处代其职权。

开办之初，陕西巡抚升允奏请前按察使陕西候补道吴树芬为陕西大学堂总办，另聘光禄寺少卿屠仁守为总教习。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2月，屠仁守因病去职，吴树芬以总办暂时兼任总教习一职。总办是大学堂初期的最高行政首长，负责统辖各员和主持所有事务。除总办外，另设总教习1人，分教习4人，帮分教4人，洋教习1人。其中：总教习每年银2400两；洋教习2400两；分教习每人年银140两，总办年薪水银960两；提调年薪水银720两；文案收支各一员，每人年薪288两；斋长4人，每年津贴银96两；司事工人，每年工食共银192两；书役斋夫等项执事约30余人，每年共约工食银1300两。纸张笔墨等项，每年约银400两，油烛茶水等费每年约600两，再加学生所需的膏火银8800两，每年共约计银26000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陕西巡抚夏时遵章将陕西大学堂改为陕西高等学堂后，按照新的《高

等学堂更订章程》，“以藩臬两司为名誉监督”<sup>[10]</sup>，取消总教习之设。由此，陕西高等学堂的校政按职位依次为监督、总办、提调、教务长、庶务长、斋务长、文案官、会计官、杂务官、监学官、检察官等。

其中：监督在办学初期为兼职，陕西按察使樊增祥兼任监督时日稍久，继樊增祥之后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陕西高等学堂始设专任监督，周镛是为首任，并任职到宣统三年（1911年），前后五年；总办在办学初期相当于一校之长，设监督后，降为统辖各员和主持具体事务者；提调在监督、总办领导之下，分管庶务、斋务或其他职事，学堂初期，滕经任提调，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调兴平县令杨宜瀚继任，并被派往日本考察学务，聘请教师和购置图书、仪器，富平知县仇继恒亦曾任提调，并拟订《高等学堂更订章程》；教务长“由教员兼充（无人则缺）”<sup>[10]</sup>，主管学科课程、教师教法、学生学业等，王猷曾由斋务长改任此职；庶务长专管堂中庶务，其下属有掌管一切文牒的文官和掌管银钱出入的会计官，以及掌管雇用人役、堂室器物的杂务官等，姚文蔚、张效铭曾先后出任高等学堂的庶务长；斋务长主管学生品行的考察和学生斋舍的一切事务，可由教师兼任，其下属有考察学生功课勤惰和学生出入起居的监学官和检查照料学生食宿、卫生的检察官，在光绪年和宣统元年（1909年）间，英文教习王猷兼任高等学堂斋务长。除以上职位外，学堂还设有养病房一所，主要为患病学生医病；设工房一所，由熟练工人随时修理学堂仪器等；设藏书楼、译书局、博物院各一所，供师生学习和研究之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曾派员专往日本采购图书、仪器，并于次年全部运回学堂。

山东历城（今济南）人，庚辰（1880年）进士，时任翰林院编修。

又名梅君，湖北人，主讲理学，陕西巡抚升允在《奏报大学堂总教习光禄寺少卿屠因病出缺折》中称赞他“品端学邃，……到堂以来综揽教规，发明正学，不厌不倦，先后两年在堂，诸生因多可造之”。

湖北恩施人，丁丑（1877年）进士，翰林院编修。

又名石笙，陕西泾阳人，任法部主事，因西忧在籍，被陕西巡抚派往日本考察学务。1906年，回国后即任高等学堂监督，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由陕西巡抚恩寿奏请批准予以奖励，加四品官衔，由法部主事升为员外郎，并回法部补用。

江西兴安人，甲戌（1814年）进士，翰林院编修，陕西候补道。

约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改任教务长，在任内的8月27日，英人指使丹麦人呼伦资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并企图运往伦敦时，以英文特长奉命出面与呼伦交涉，结果盗买协议被废除，是日原碑由西安西郊移至城内碑林保存。候补知县，1905年10月曾往日本考察学务、工艺等。

参考文献:

- [1] 光绪朝东华录 [M] . 第4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2] 秦中官报 [C] . 丙午年 (1906年) 7月第2期.
- [3] 樊增祥. 陕西高等学堂开学训词 [N] . 秦中官报, 1906 (2): 32~ 33.
- [4] 清季各省兴学史 [J] . 人文月刊, 第1卷 (下) 第7期.
- [5] 魏光焘, 奏设游艺学塾疏. 光绪朝东华录 [M] . 第4册.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6] 清西安府图 (根据光绪十九年十月中浣舆图馆测绘图改绘) . 见: 张永禄主编. 明清西安辞典 [M]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插页.
- [7] 藩司樊增祥. 批高等学堂监修委员会涂令嘉荫工竣报销并请派员验收禀 [N] . 秦中官报, 1906 (5): 258.
- [8] 陕西大学堂. 大学堂章程 [N] . 秦中官报, 癸卯年 (1903年), 9月份第1期.
- [9] 升允, 屠仁守, 樊增祥等. 陕西大学堂楹联 [N] . 秦中官报, 1904 (3): 16
- [10] 仇继恒拟稿. 高等学堂更订章程 [N] . 秦中官报, 1905 (1): 7~ 8.

(责任编辑: 肖 鹰)

## Study on the Earliest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in Western China

### —— Shanxi Grand School

YAO Yuan

**Abstract** Having gone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on the new papers and journals published in Qing Dynasty, a distinct history has been discovered. It had gone a long way from ChunMing School QingMen School Yang Zheng Art School Chong Hua and You Yi Comprehensive Schools Shannxi Grand Schoo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verifies from the angle of history the origin, inheritance, construction,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of Shannxi Grand School. The conclusion that has been reached indicates that Shannxi Grand School was the earliest local and comprehensive institute of higher learning in western China. The curren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was founded based on it. The School was also a turning point in education from an art school system to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system in Shannxi. It marked the forming of new educational system in higher learning by introducing the educa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Key words:** Shanxi grand school, western educational system, Japanese teaching policies, education promotion at the end of Qing Dynasty, current education in higher learning